

相近，往還便捷，其形貌文字，悉與華同，以此攫取我內地物資之利，操縱工，滋害必愈大，更非西洋比也。……「琉球問題發生，前
中人如張之洞等極力主張對日妥協，用以全力對俄，獨有李鴻章一人挺身反對，他有幾句很精彩的語：「與其讓於俄而後不能助我以拒俄，則
我既失之於俄而又將失之於俄，何如稍讓於俄，而我內得借俄以備倭。……」甲午之役以後，李氏看到日本新興勢力之可怕，所以毅然前來
俄京，商議俄同盟以對付日本，可是當時中國國力孱弱，配不上李氏的反日國防外交，所以甲午戰後，李氏的反日政策，由主動而陷於被動
，及至日俄戰後，聯俄亦不可能，於是中國外交從彼時起，走上了傍徨無依之路，這就是說從可「泣」之買踏上「悲」之「悲」之途了。

李氏沒後，中國的國際環境日趨惡劣，各國相繼要求勢力範圍，而朝廷中人也無外交人才，所以直到清社既覆，中國外交沒有明期之日。
民國成立，國家面目煥然一新，對外關係不可謂不一新，但外交者只注意於交節的應付，而無根本的方針。歐戰前後，國際環境對
於中國不甚利，但從巴黎和會起，中國對外關係，更趨惡劣。巴黎和會對敵「和」的對象，至少不至於造成今日日本獨霸遠東的局面。在
巴黎和會中，中國有很有色的新進外交人才，亦有很有於中國的國際環境，不過事先政府並未聯絡友邦，亦無一定方針，以至本可有利於讀者
，反而有利與日，華府會議時，美國有意阻止日本的侵略，因遠東的和平秩序，可憐我國並無積極有力的表示，而形成華府會議後，日美
一度近乎妥協的局勢。（即石井與李鴻章會面會。）

民國十四年，國民革命運動興起，嚴平等條約之要求，一時成爲反帝國主義的先聲，廣州和武漢國民政府時代的外交政策，受其影
響甚大。當日執外交者，頗能以新的交涉姿態，與舊日外交者迥異。交關係，比如對日領事裁判權的矯正；租界行政權的收回；外人懸壺權的
限制，均有成效可觀。可惜這種革命外交，不能與國力並進，也不能確立一定對象，今日抗英，明日仇法，其結果終至列強皆成爲中國敵人，
認爲中國真正之敵人者！日本帝國主義——反日可與可與，坐收漁翁之利。此時中國外交，可算是有政策時期，但是政策的運用，並無把握
爲其掩護，配不上複雜的國際關係。

以全體列強爲交涉對手的中國外交政策，反而緩和了日本在國際間獨立的奢願，從一九二一至一九三〇年止，日本在遠東的活動，從表面
上看，似乎較爲緩和，實際上他在中國東三省的侵略行爲，暗中十分積極。我國政府對於這種國際形勢的轉變，事後毫無措置，反而以爲日本
態度轉向緩和，中國可以相安一時，對外關係也不積極設法發展，除了支節應付以外，根本無外交可言。

孰知幣原的緩和外交，正是日本侵襲的一個幌子，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突如其來，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形勢業已造成，美俄兩因心中雖
然痛恨日本行爲，也是孤掌難鳴，愛莫能助。其他列強也不願多管閒事。我國外交臨時慌忙，因而不得不走上毫無辦法的國際路線，這時也是
中國外交表現極度悲慘景色之時。

從「悲涼」而再轉入於「壯烈」，開始於一九三五年。國聯處理中日事件，不但對中國是一種失敗，而且在日本看來，也覺得不是一種滿
意的辦法。日本需要解決中國問題，所謂中日直接交涉，就在這種情勢下開始孕育。日本軍閥企圖以不戰勝華的野心，向中國作一次單刀直入
的談判，在中日交涉史上佔重要一頁的川樞張景惠談判，繼一九三五年一月，廣田三原則的宣布在南京舉行，當日我國外交當局對於日本政府無
端要求，一一處理力駁，極盡交涉能事。但是直接交涉之於當時，決不能代替我們的根本外交政策，其稍強於走國聯路線者，只是因爲比較具
體，要是日本軍閥真能悟，還未始不是一個安全遠東秩序的辦法。反之，日本軍閥不覺悟，中國只有被裹而走上抗戰之路。

命運註定了中國要走向悲壯自強之路，八一三全面抗戰繼一九三五年中日直接交涉，露出了反日外交的輪廓，悲壯而有自信，自信而顯
光明，抗戰六年以來，世界局面的演變，變與我們的理想相吻合。中國的敵人，已成爲世界的公敵，醜態百出的反日外交，早已在

略與位極尊貴的舞會上樹立其光輝顯明的旗幟，這不算是我國外交上的極大成功和傑作嗎？「背水之陣」，是全局變換的主要關鍵。在近百年的中國外交上，情調由「泣」而「歌」而「悲」而「壯」而「喜」，廢約運動自始至終，成爲一部有力而顯明的插曲。廢約要求開始於巴黎和會，和會中，我國代表提出七項問題，請求各國考慮，但各國忙於歐洲問題，未予解決，其後華府會議在東京舉行。我國代表重彈辭詞，遂有「四國公約」的通過，但此議決案對於我國要求，並未抓到痛癢之處，即「中國司法調查委員會」亦未組成，中國所得之同情，彼時僅虛有其名而已。

民國十六年，國民政府在廣東成立，自主的廢約運動才開始。八月十三日伍朝樞宣佈：「否認從前舊約」，主張與關係各國「另訂新約」，十七年國府遷都南京，外長黃郛復申舊言：「現在公認不平等之中外各約，國民政府爲求其早日廢除起見，當排力準備，切勿最短期內，與各邦開始訂立新約，以平等及其互尊重重要爲基礎。」六月十六日外交部即根據黃外長談話，發表廢約宣言，「惟中國八十年來，備受不平等條約之束縛，此種束縛，既與國際互尊重之原則相背，亦爲獨立國家所不許，今當統一造成，應當遵照正當手續另訂新約，以平等互尊重爲宗旨，」此項宣言，即根據情勢變遷之原則而發者，惜列強諸國並無反應，而我國國力又未及於自更生之道。單獨宣布廢除，在此時期，廢約運動未具體告成，但於租借地及會審權之收回，則頗著成效。十七年收回上海會審公所：力人等與各國組織法院會議；十九年二月，正式簽訂上海租界法院協定；威海衛青島等處租借地亦陸續收回，集腋成裘，當時種種努力，不能不說是今日外交上成功勝利的原因呢？

自民國二十一年至二十六年，我國對於領事裁判權的收回運動進行甚烈，亦相當發生效力。自民國二十六年抗戰開始，廢約運動急轉直下，英美友邦自動的宣告願意放棄在華種種非法權益，另與我國訂立平等條約，這正是近百年外交的一個很大勝利。以訂立不平等條約開始了中國前百年外交的黑暗之頁，又以修改不平等條約顯露出了中國後百年外交的光明之路。於此，實使我們相信自力更生的重要，「自助天助，自助人助」這名不虛傳的兩句老生常談。

三十二年秋月重訂。距南京條約訂立紀念日前七日 一

西北經建與西南經建的關聯性

陳豹隱

一國的建設事業，無論那一部門，都是與其他各部門相關聯的，例如一國防務建設事業，就勢不能不與其國的政治建設經濟建設及文化教育建設相關聯。同樣一國的經濟建設，無不其中的一部份，都與其他部份相聯，大之如像工業建設不能不與農業建設相關聯，小之如像輕工業建設不能不與重工業建設相關聯，都是顯著的例子。筆者在這裏所要說的，却不是這種普通的關聯性，而是指在西北經建與西南經建設計和實施上的關聯性。關於西南經建的議論，在抗戰開始前後，曾盛極一時，近年則因西南經建已入於實際建設時期，一般的討論文章已不多見。反之，關於西北經建的議論，則在實際的客觀

的需要十分迫切的狀況之下，近年來大有風起雲湧之勢。筆者因職務關係，對於西北經建的議論，曾不斷潛覺研究，感覺這些議論比當年的西南經建議論更爲周到翔實，可爲經建理論水漲加高之徵，但同時又感覺某些部份尚有美中不足之嫌，如像本題所說的西北經建與西南經建的關聯性，就是其中的一例，尚待繼續研究解決辦法。

依據者拙見，在西北經建與西南經建之間，當開普遍的地理上經濟上及政治上的關聯之外，尚有一個特殊的密切的關聯性，而爲西北經建與東北經建及東南經建間暨西南經建與東南經建及東北經建間所未有者，以下請從三方面說明此種關聯性存在之理由。第一，從國防

經濟建設上。西南經濟之其利於國防，已為六年來抗戰事實所證明。如待多遠，西北經濟之主要目標，在建立國防重工業。第二根據地，亦為多數論者公認之理論，不必贅論。然從整個國防經濟建設之立場言，無論在資源上，在人力上，在戰略形勢上，俱應使西北經濟與西南經濟相輔相成，始能完成一個第二國防經濟建設區之計劃。使與東南東北沿江沿海區之第一國防經濟建設區相輔相成，而置中國國防經濟於永遠不敗之地。當然，在和平恢復後，中國不能忽視第一國防經濟建設區的工作，但是，鑒於日抗戰史上，沿江沿海區之國防經濟建設區之痛苦，中國更不能忽視第二國防經濟建設區的工作。第二，從計劃經濟的理論上看，計劃經濟的主目的，在以人為力，補助天然狀況之缺陷，或者還可以在以人力打破天然的限制。如果此理不謬，中國對於該用人力打破西北與西南間之地形上及資源上的天然限制，而使西北經濟與西南經濟互相輔成，而置國防經濟建設之要求。假如不如此着想，而單單的顧慮天然形勢，那末，從經濟上，西北經濟自然會與東北經濟相輔，西南經濟自然會與東南經濟相輔，便利說，結果，在經濟區域關係上，將會形成東北到西北的一大區域，和從東南到西南的一大區域，就是說，兩個經濟的區域，而不能形成兩個經濟的區域。這樣，不但不能達到國防經濟建設上的需要，而且將使西北經濟和西南經濟長遠的不能達到自主自立的階段。所以，中國應該依計劃經濟的原理，忽視經濟上的損失，使西北經濟和西南經濟打成一片。第三，從最近經濟建設的環境看，其中又分數層：(一)目前中國海口的被封鎖，即便在一年前即解除封鎖，然由

東南沿海及東北到西北的建設對其的價值，因復興關係，亦當不為，毋寧以溝通西南與西北最為急迫之務。(二)西南經濟大體當於中肯的建設，正可移用於西北經濟。(三)西南地方情形，從政治，文化，經濟水準，民族關係，等等關係看來，大致與西北同其方向而與東南及東北相異。因之，以西南經濟的經驗移用於西北，必較移用於東南或東北更為適宜而有效。(四)復員以後的西南經濟事業，依常規，難免受相當挫折，若使西北經濟與西南經濟打成一片，則便可免此不幸。

以上說以觀之，可知西北經濟與西南經濟之間，更有密切而重大的關係，如能一體而為推廣運用之，則可使國防經濟建設趨於安全之境。而若若得來的西南經濟基礎，亦不致因復員而動搖。否則不能使國防經濟建設之需要，又不能使西南建設的或半成的建設，久遠其其利，殊為不合理。

至於如何才使西北經濟與西南經濟間的關係性推動起來，運用起來，那是另一問題，此處無暇申論。不過，筆者考慮所及，至少似有如下諸端：(一)努力完成並發展橫貫西北及西南的交通幹線，不使因長工作而稍，停滯現象。(二)用重點主義的方法，扶植沿此交通幹線兩旁的工商業發展，而不採用普遍發展的方法。(三)採用使西南經濟事業東到西北設立分設分公司的方法，而不使西北經濟事業全另起爐灶。(四)採取特別長期保護西南及西北經濟事業的經濟政策，而不為全國產業平等之對待所困，任其自生自滅而受東南及西北經濟事業同來的壓迫。(五)對於西北的經濟問題，應側重西南工人商人的移住，而不採用注重農民移住及屯墾的辦法。

論中國共產黨關於解散共產國際的決定

葉青

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在本年五月二十八日出版的「新

華日報」上，發表了一篇關於共產國際執行主席陳德壽與共產國際的決定。它除開贊成那個提議，主張解散共產國際外，說了許多關於中國共產黨的話。這些話究竟對不對呢？注意中國共產黨問題的人，

有來討論的活更。

現在我將這些話分成三段條出，並於每段之後加以分析與批評

第一段「中國共產黨的創立，是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以來中國區

其運動發展的結果，是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結果。也是那裏有無產階級和工人持動，那裏便會有一天出現無產階級政黨。假使從來沒有共產黨，中國共產黨亦必將應運而生。這是歷史必然的定律。……革命不能驟出，亦不能驟入，而只能由每個民族內部的發展所引起。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從來所闡發的真理。中國共產黨的實踐，完全把這真理證明。

這一段話底主要意思在於說明中國共產黨是中國歷史發展的結果，與共產黨之存在與否沒有關係。這是中國共產黨用以安定那因共產黨而動搖的內外（此外是就其同情者及可能加入者而言）一人的方法。所謂中國歷史發展，是意味著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因為要資本主義發展而後階級分化明確，俾有工人運動底發展，由此出現無產階級政黨——共產黨，革命始能——族內部的——外輸入。這樣，我們就有三個問題要討論了。

首先是中國資本主義之發展問題。中國資本主義未發展。所以中國共產黨人在分析中國經濟時，說它是半封建經濟；在認識中國社會時說它是半封建社會。這樣，中國經濟不是資本主義經濟，中國社會就不是資本主義社會了，那末馬克思所說的共產主義基礎，又存在於何處呢？根本沒有。既然如此，中國就不應該有主張共產主義的黨了。但在實際上却有一個。如非自外輸入，其根據又安在？所以中國共產黨不是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結果。

其次是中國工人運動之發展問題。既然資本主義未發展，無產階級就不強大。所以中國共產黨人說它底「數量常在二百五十萬至三百萬之間」。在人口有四萬萬五千萬的國家中，這個數量未免太少。因此，工人運動發展的話就無從說起了。五四運動以來的二七罷工，五卅罷工，省港罷工，皆在有了中國共產黨以後，乃人工泡製而成。近十五年，因為中國共產黨到農村去了，這種罷工便一次也未再有。所以中國工人運動不會到產生共產黨的境地。「中國共產黨的創立是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以來，中國工人運動發展的结果」一句話，根本沒有根據。不啻二七罷工和五卅罷工等在中國共產黨創立以後；就是

工會組織的全國總工會，亦在中國共產黨創立以後。一個共產黨人總其所著「中國近代革命運動史」中說：「在中國共產黨的積極活動下，中國工人階級在五卅運動消沉後，開始形成了自己的組織」。這不是個很好的證明嗎？所以中國共產黨不是中國工人運動發展的结果。最後是中國革命發生之原因問題，這裏說的革命，乃就中國共產黨所做的革命而言，與中國國人所做的不同，如此的革命，並非中國歷史發展的結果。既然因為中國資本主義未發展和中國工人運動未發展，中國共產黨不能發生，又怎能有所做的革命呢？然而竟自有了。此非輸入而何？所以中國共產黨所做的革命，不是中國民族內部發展的结果。

從此種種，可知中國共產黨及其革命，均不是中國歷史的必然了。事實上全皆自外輸入。中國共產黨始於一九二一年，在共產國際成立一年多以後。賡述共產黨人在其所著「中國近代革命運動史」中說：「一九二〇年春，共產國際派歐金斯基和楊明齋（華僑，山東人）同志來華創立黨的組織。首先找到了陳獨秀，遂於一九二〇年五月在上海發起組織中國共產黨」。這不是一個鐵證嗎？從而中國共產黨底革命之為輸入，就不待說了。

第二、「中國共產黨從一九二一年創立時起，即在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明確的向全中國人，指出了反帝國主義和反封建的道路。而且全黨同志以身作則，忠心不貳的為自己民族的解放事業而奮鬥，流血犧牲，前仆後繼。中國共產黨在革命鬥爭中曾經獲得共產國際的許多幫助。但是很久以來，中國共產黨人即已能完全獨立地根據自己民族的具體情況和特殊條件，決定自己的政治方針和行動。……而自抗戰以來，即在敵後推行歷史上空前艱苦的鬥爭。這完全是中國共產黨徒手空拳，不假任何外力而獨立創造起來的。可以說在最近十年的中國革命運動中是歷史上無前例的。

這一段話，是接前引第一段話而來的。既然中國共產黨是中國歷史發展的結果，它就能夠不依靠外力而完全獨立地決定自己的政策和行動。事實呢？它成立時即向全國指出了反帝反封建的綱領。因此

戰以後的敵後鬥爭，尤為其獨立創造之光輝的證明。這些是對的嗎？我想同樣分成三個問題來討論。

首先是中共政策行動之決定問題。我們已說明中國共產黨不是歷史底必然而是外力所使然，因此它不能完全獨立地根據自己民族具體情況和特殊條件，決定其政策行動等事。這點，毛澤東也承認的。所以他主張「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但是三年以後，即去年二月，他還說：「我們的理論不能夠與革命實踐相平行」而「顯得非常之低，非常之落後」。然則怎樣辦呢？依據共產國際。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之主張參加國民革命，乃共產國際使然。其黨人之加入中國國民黨，則根據共產國際指示在第三次大會決定的。而第五次大會更「完全和一致接受」共產國際關於中國問題的提議，「未加絲毫修改」。這一點，是他們著的「中國共產黨簡史」上說的。一九二八年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大會，完全接受共產國際第九次擴大會議對中國問題的決議案」，則明寫於其「政治決議案」之中。這是中國共產黨努力維持埃運動的根據。以後因為李立三執行錯誤，遂大引起「國際路線」來，意即依照共產國際底政策而行動。到一九三五年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對中國有了改變政策的決定時，中國共產黨遂有八一宣言和十二月決議，是即從前年到今天的「抗日救國」之所由來。這點，康西寧在四年前的「共產國際二十週年」一文中還有所透露。這就不得不將中國共產黨在贊成解散共產國際的決定中要說「中國共產黨在革命鬥爭中曾經獲得共產國際的許多幫助」那句話了。此「革命鬥爭」是到本年五月，共產國際提議解散時為止的。據在理論上亦必如此。因為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底支部，一九三八年初版的「中國共產黨黨章」第一條有明白規定，那末它在共產國際未解散的時期中，便有限於其章程和決議的義務。所以「很久以來中國共產黨人即已能完全獨立地根據自己民族的具體情況和特殊條件，決定自己的政治方針政策和行動」云云，是個大膽的自誇。

其次是反帝反對封建之指出問題。依中國共產黨底意思，好像中國人民之走上反帝反對封建和反對封建階級的途徑，是從它在一九二一年

時起。其實，這個道路底指出，早在它底創立以前很多年。拿反帝而有主義來說。一八九二年（據胡編「總理全集」）底「興中會宣言」，即是一個反帝國主義宣言。所謂「方今強鄰環列，虎視鷹瞵，久垂窺我國中華五金之富，物產之多。蠶食鯨吞，已見效於踵接；瓜分豆剖，實堪慮於目前。嗚呼危哉！有心人能不大聲疾呼，拯斯民於水火，扶大廈之將傾。庶我子子孫孫，或免奴隸於他族。」這不表示得很明白嗎？一九〇五年同盟會「軍政府宣言」，就是一個反對封建制度底宣言。它在消極方面主張「斬絕」「政治之害如政府之壓制，官吏之貪婪，差役之勒索，刑法之殘酷，捕捐之橫暴」和「禁止」「風俗之害如奴婢之蓄養，刑法之殘忍，鴉片之流毒，風水之阻害」在積極方面主張「建立民國」，「制定憲法」，「凡我國民皆有參政權」，「皆有自由平等博愛之精神」。這不又表示得很明白嗎？總之，「中國以千年專制之毒而不解，異種殘之，外邦逼之，民族主義與封建制殆不可以須臾緩」（國父）。此二主義顯然是反帝國主義和反對封建制度的因子。而中國國民黨同志復又以身作則，忠心不貳地為之奮鬥，流血犧牲，前仆後繼，凡五十年。今則不平等條約廢除，而王朝和軍閥先後推翻，建立了獨立的中華民國。這樣，中國共產黨便來遲了。其指出和奮鬥皆不過它由其一全大會底社會革命路線，走到民族主義，民族主義底下的意思。這對於它倒有新意義。對於中國國民黨及其所領導的中國人民，則甚早已實行了的國民革命路線。

最後是中共敵後鬥爭之價值問題。中國共產黨自抗戰以來的敵後鬥爭，既可說是「艱苦」，亦可說是「創造」。但比之於最近數十年的中國革命運動，則又不及其多。在最近數十年內，中國國民黨以約二十年之艱苦鬥爭，而創造了真正的中華民國；又以好些年之艱苦鬥爭而創造了統一的中華民國；那末中國共產黨說它底艱苦創造「在最近數十年的中國革命運動中是歷史上無前例的」底話，不是有些虛非觀天，夜郎自大嗎？現在我們問它到底創造了甚麼？那當然是相當大的游擊根據地和游擊軍隊。這並不是打退了敵軍呢？不是。那當然是不能。游擊只是游擊，決不是真正武裝底鬥爭。

國共產黨則不以游擊戰和游擊軍隊從事游擊。它僅以之擴
張實力，佔領地盤，破壞敵一，破壞抗戰。所以它底艱苦鬥爭中的
創造，除對於它自己有利外，沒有一點價值。老實說，艱苦鬥爭中
的創造對於國家和抗戰有極大利益，因值得敬重。像中國共產黨
之所為，則不過利用抗戰以遂其國家民族以外的私圖而已，又何足道
呢？

第三段「中國共產黨人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因為馬克思列寧主
義是科學，是沒有國界的。中國共產黨人必將繼續根據自己的國情，
靈活地運用和發揚馬克思列寧主義，以服務於我們民族的抗戰建國事
業。中國共產黨也是我們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優秀傳統的繼承者
，把這一切優秀傳統看做和自己血肉相連的東西，而且將繼續加以發
揚光大。中國共產黨近年來所進行的反主觀主義，反宗派主義，反黨
八股的整風運動，就是要使得馬克思列寧主義這一革命科學更進一步
地和中國革命實際——中國歷史中國文化深相結合起來。這一運動表現了
中國共產黨人在思想上的創造才能，以及他們在革命實踐上的創造才
能，表現了中國共產黨人一定能夠和中國人在一起完成中國人民所
賦與的各種歷史大任。」

這一段話底主要意思有三個。因此我將這一段話分成三個問題來討論。
首先馬列主義之國界問題。中國共產黨以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沒
有國界。為甚麼呢？因為它是科學。科學是沒有國界的了。其
實事情如我在「三民主義文化運動」一書中所說，科學有一般性
和特殊性，因而有世界性和民族性的，不能統統地說沒有國界。如
果單就理論本身而言，則如國父之所了解，自然科學沒有國界，社
會科學有國界。他說：「中國的社會……和歐美的不同，所以
管理社會的政治自然也和歐美不同」。這樣，研究社會現象的社會
學和研究政治現象的政治學便可以有國界了。當然這是就它們底特殊
性而言的。中國共產黨承認各種底特殊性，自不能承認社會科學，在
某些方面的國界之存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為革命科學，自然屬於社會
科學一類。那又怎麼能說它沒有國界呢？所以實際如我們常說的，馬

克思主義，特別就其目的性和變遷性的部份！社會主義而言，則是
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產即歐洲及其相同地方的。只有在那些才有特
產制底基礎和階級鬥爭底因素。同時也只有明顯的經濟力量 and 物質
力量。資本主義未發達的國家，譬如中國，根本沒有這一切，而以求
生存為主，需要民生主義。就是民族底權問題，亦以民生為基礎。需
要民生哲學。至於列寧主義，史大林說：「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和無
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這就只有資本主義發達到帝國主義
時代，同時又到無產階級革命時代才適宜於它了。可見列寧主義仍以
歐洲及其相同地方為範圍。中國既然資本主義未發達，就談不到帝國
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那又怎麼適宜於列寧主義呢？所以馬克思列寧
主義有國界，是一種鐵的事實。

其次是馬列主義之應用問題。中國共產黨承認中國與歐洲底不同
，但以為這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否適宜的問題，而是馬克思列寧
主義如何應用的問題。只要能夠根據自己的國情靈活地運用就行了。
其實，要在這方面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差別不微，
或者說，差別不同，才有靈活的運用可言；在根本不適宜於馬克思列寧
主義的資本主義未發達國家，差別巨大，簡直有質的不同，那便無從
運用起。於是靈活運用亦沒有補益。所以不能適宜就意味不能應用
。機遇的利用。勉強應用必然變質。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
應用於中國，最初，或稱馬列主義，其後便成爲「中國化」，即「
東不問白這原因，以為是應用不好所致，大叫其「中國化」，即「
適應民族形式」，亦即「應用到中國具體環境的具體鬥爭中去，而不
是抽象地應用」。這不就是所謂「靈活地運用」嗎？然而三年之「又
變成主觀主義派主義黨八股去了。毛澤東於是又發起整風運動來反
對主觀主義派主義黨八股。所以靈活運用也失敗了。不適宜於中國
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根本不能運用於中國。我請它回歐洲去，是很對
的。然而中國共產黨反動地說「整風運動」表現了中國共產黨人

種思想上的創造才能，以及他們在革命實踐上的創造才能」。既然反
宗派主義反宗派主義反黨八股的整風運動，是中國共產黨人在思想上
和實踐上的創造，那末反機會主義的自動主義運動，反官僚主義的立
三路線運動，反立三路線的國際路線運動，反國際路線的民族形式運
動，反民族形式的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運動，都加中國共產黨人
在思想上和實踐上的創造了。這樣，我們還有甚麼話說呢？那就讓
們去創造吧。

最後是中國文化之繼承問題。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於中國，顯然
表示中國就是資本主義未發達，無產階級未強壯，亦非馬克思列寧主
義不可。這豈非以為中國沒有產生出適宜於它的主義嗎？中國沒有產
生出適宜於它的主義，那末中國底歷史發展就有如「結果實的虛花了
。那樣，「我們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都沒有價值了。然而中國共
產黨却說它們都有「優秀傳統」，並願為此「優秀傳統的繼承者」
。而且誓下彷彿它還發揚光大過？所以說它「將繼續加以發揚光大」
。這完全是一種詭言。共產黨人是「民族主義者，不是「民族主義者。因
此他們信奉歐洲底馬克思列寧主義，而不信奉中國底三民主義。同時
對於「民族主義者繼承「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優秀傳統」時則祇為
復古。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實。說「中國共產黨近年來，進行的反主觀
主義反宗派主義反黨八股的整風運動，就是要使得馬克思列寧主義：
……和……中國文化深相結合」，更完全是一種詭言。毛澤東說
：「黨八股……是主觀主義與宗派主義的一種表現形式」，而「一
切宗派主義思想都是主觀主義的」，所謂「主觀主義是一個不正派的

學風，他是反對馬列主義的……我們要的是馬列主義的學風」。這
末整風運動底理論意義「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風運動了。所謂「
使得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文化深相結合」底地方，究竟何在？於是
說整風運動「表現了中國共產黨人一定能夠和中國人在一起，完成
中國人「所賦予的各種歷史大任」，也就是語言中的語言了。老實說
，「能夠和中國人在一起，完成中國人所賦予的各種歷史大任」
的黨人，是有中國歷史發展所產生的三民主義的中國國民黨人。有
展他們才是「我們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優秀傳統的繼承者」……
並且將繼續加以發揚光大」。

總括看來，中國共產黨關於解散共產國際的決定中說的那三段話
，雖然包括了三個問題，其意「外於說：中國共產黨是中國歷史發展
的結果，所以能夠應用無國界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於中國，於特殊情形
中以決定自己底政策和行動，它在政治路線和軍事戰爭方面有所貢獻
，將由繼承中國文化傳統到底完成中國歷史任務，它是和中國人民在
一起的。這和明白，那三段話不過是原為共產國際之一支部的中國共產
黨，在共產國際解散後不得不以民族黨自承，來肯定其存在底根據和
任務而已。

雖然如此，我們應該歡迎中國共產黨之由國際黨轉變而為「民族黨
，游子住外失了依歸，歸國故鄉。家族中人說，他在外「了大事，因
為他是家族中的一份子，今後還要怎樣為家族爭光。家族中人雖不相
信他底話，總是歡迎他歸鄉認宗。我們對於中國共產黨的態度，就是
家族中人對於游子的態度。

本刊訂閱辦法

三個月 十七元 半年 卅二元 全年 六十九元

- (一) 外埠免收郵費(如須掛號者每冊另加郵費二元)
 - (二) 優待專科以上學校學生及學校教職員團員黨費八折收費
 - (三) 費款請由銀行或郵局匯下(請附實屬上海郵局匯票)為
- 現代洋九五通用掛號一元以上海匯

明代初年地方政治之整理

鄒師許

一 引論

明太祖以匹夫崛起，驅逐胡元，以民族立場言之，確堪稱為我國歷史上不可多得之英雄豪傑，顧世之論者，每忽視其政治上的創造，以為亦不過僅如漢之高祖而止，其實不然，明代初年政治的設施，確有不少是為後世所取法，故明白英宗以後，內外多故，國事日非，而猶能支持二百年，繫民心於不墜，這並非可俾而致的。茲特就其地方政治上所表現者，著之於篇，以告世之研究政治史者。

我國政治的腐敗，以元代為甚，其是元代的末年，賄賂公行，貪污無厭，民之不能為生已久。明太祖及其起義諸臣，莫不深受其害。一旦大權在握，而謀所以改造之，固為意中之事。明太祖於我馬佐德之際，自能手不釋卷，日以資治通鑑一書為其良好伴侶，蓋為此。幸其時醫藥學者如陶安、葉兌、朱濂、劉基、孫過、秦從龍之輩，亦有政治參與，為太祖所深知，一時繼致左右，教諭有加，明史家稱之曰：太祖自迎之於龍江，因避從前與同處，朝夕訪以時事，事無大小，悉與之謀，嘗以筆書漆簡，問答甚密，左右皆不能知。其茶餘飯後所談論者，要無非後日政治上的設施，以吾人今日所見，明太祖不但為歷史上的英雄豪傑，且足為二代的大政治家，則其環境教育勢力至大。這是本文所當先為說明的。

二 地方行政之根本規畫

明初承元季凋敝之餘，人民逃散，流賊四起，地方行政毫無基礎。故（甲）戶口的調查，（乙）坊廂里甲的編制，（丙）賦役黃冊的製成，最為明代地方行政的根本，而（丁）土田的丈量，（戊）糧長的設立，亦為推行行政，增加國庫所必要，所謂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為我國上世政治原理的不二法門，茲約述之如下。

（甲）明初關於戶口的調查，係用兩子監生（按即今日在國立大學肄

業的大學生）為之。先查明人口疏密的程度，與土田多少為比例，分別定為寬狹鄉，政府酌令遷徙。明史食貨志云：「明初嘗徙蘇松嘉湖杭之無田者四千餘戶，往耕臨潁，給牛種車糧以資墾之，三年不能其稅。徐達平沙漠，徙北平山後民三萬五千八百餘戶，散處諸府衛，籍為軍者給衣糧，給田。又以沙漠遺民三萬一千八百餘戶，屯田北平，置屯二百五十四，開地千三百四十頃。復徙江南二十四萬於臨陽。戶部郎中劉九皋言：古狹鄉之民，聽遷寬鄉，欲地無遺利，人無失業也。太祖採其議，遷山西澤潞於河南，又徙登萊青民於東昌兗州；又徙直隸浙江二省戶於京師充倉儲夫。太祖時徙最多，其間有以罪徙者。可見以罪徙者，是少數，而徙民的原意，完全是出於寬鄉狹鄉的調劑，欲人盡其才，地盡其利，使民為地方行政的根本規畫無疑。

（乙）明初關於坊廂里甲的編制，即今日所欲推行的保甲制度。明史食貨志云：「太祖顧天下戶口，置戶帖，戶籍。其書名或居地，籍上戶部，帖給之民，有司歲計其登耗以聞。及郊祀，中書省以戶籍陳壇殿之天，祭畢而藏之，洪武十四年詔天下賦役黃冊，以一百十戶為一里，排丁糧多者十戶為長，餘百戶為十甲，甲凡十人，歲役里長一人，甲首一人，寬一里一甲之事，先後以丁糧多寡為序，凡十年一閱，曰排年，在城曰坊，近城曰廂，鄉曰里，里編為冊。冊首總為一閱，錄案孤獨不任役者附十甲後，為畸零，備資給度。有田者編冊如民科，無田者亦為畸零。每十年有畸零更定其冊以丁糧增減而升降之。冊凡四：一上戶部，其三則布政司府縣各存一冊。上戶部者，冊黃紙，故謂之黃冊，年終進呈。送後湖東西二庫皮藏之。歲令戶科給事中一人，御史二人，戶部主事四人，置役冊。其後黃冊紙具文，有司徵稅編籍，則自給冊師，曰白冊云」。保甲為推行行政，實施稅冊編籍的根本組織。

有司的自備情形不明外，其賦役黃冊，分籍四份，戶部與司府州縣互相考核，互相校勘，而又慮有訛舛，政府復為之派員校正，已可見其鄭重其事。郊天大典，中書省至以戶籍陳壇下而屬之有天，其度歲則另於後湖庫行之；史又稱太祖每每展覽戶籍，計其登籍，則其重視更可知。而每戶給以戶帖，俾得存查，以示公開之意，更與今日戶政無異。其所請排年者，亦欲以示均勞；而時常不科，則又較宋代王安石之助役錢為寬大。誠足為古今保甲制度之規範。至每十年有司買定其冊一語，未免含混不明。查此文互見明史范敏傳中，敏所定之法，實年年更改，以適合現狀，閱十年乃清造一次，故云然耳。

(丙)全國黃冊既編定，則賦役制度，自可得而實施。明史食貨志云：「太祖即位之初，定賦役法，一以黃冊為準。冊有丁有田，丁有役，田有租，租曰夏稅，曰秋糧。凡二等。夏稅無過八月，秋糧無過明年二月。丁曰成丁，曰未成丁，凡二等。民始生，籍其名，曰不成丁，年十六曰成丁；成丁而役，六十而免。又有職役優勞者。役：曰里甲，曰均徭，曰雜泛，凡三等。以戶計曰甲役，以丁計曰徭役，上命非時曰雜役，皆有力役有均役，府州縣除冊丁口多寡，率詳厚薄，以均適其力。大概徐役均徭，一以黃冊為準，夏秋兩稅，則參之魚鱗圖冊，蓋亦以與土地的文量有關，惟自白身贖行，有得得以操縱，而黃冊便成爲具文了。」

(丁)士田的文量，亦爲明初地方行政根本規畫之一，蓋元季喪亂，版籍多亡，田賦無準，不得不重爲清理。明史食貨志云：「明太祖即位，遣周鑑等百六十四人覈浙西田畝，定其賦稅，復命戶部覈天下士田，而兩浙富長避役徭，大率以田產寄他戶，謂之織脚贖寄，洪武二十年命國子生武臣等分行州縣，隨糧定區，區設糧長四人，量度田畝方圓，次以圖字號，悉書主名，及田之丈尺，編類爲冊，狀如魚鱗，號曰魚鱗冊。先是昭天下編黃冊，以戶爲主，詳具舊管新收開除實在之數。爲四柱式：而魚鱗圖冊，以土田爲主，詳具原項項下濕沃瘠沙鹵之別異具。魚鱗冊爲經，土田之設爲緯；黃冊爲緯，賦役之法定焉；凡管實田土，備管

稅糧科則，官爲籍記之，毋令產去稅存，以爲民害。一按魚鱗圖之制，爲田土的最要底冊，明初創之，迄清代沿用。爲地畝的優良施設，次以字號，編類爲冊，凡土田買賣，備書稅糧科則，去今日的科學管理無幾。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戊)明代糧長之制，屢革屢復，而終於革廢，其得失殊未易言，大抵糧稅之徵收，爲國家經常收入的最大宗，然郡縣胥吏經營其事者，每多額外徵收，閭閻受其害至大。明太祖生長民間，深知其弊，故於洪武四年九月，命有司料民田，以田多者爲糧長，即所以除去其害，明史食貨志云：「糧長者，太祖時令田多者爲之，督其鄉賦稅，歲七月，州縣委官借詣京領勘合以行，糧長石長副各一人，輸以時至，得召見，語合輒蒙擢用」，其後並定「糧長有難犯死罪及流徙者，許納銅贖罪」，其意蓋謂小農納稅不多，不能辦納贖，糧多者除應自納外，並替其鄉賦稅，其事易行，故給以糧長名義，使負其責，然又以規避逋欠勢所不免，則爲糧長者難保無虧折賠累之情，因又定爲召見贖罪兩法，以償其已盡的義務，故糧長的設立，尙爲明初準情酌理的善制。

編籍已有里長甲長負責執行，督賦復有糧長爲之代辦，故明初地方政治雖不如現代區公所鄉公所的嚴整，而政令的推行，下形情上達，已可無甚隔閡了。

三地方吏治之嚴加整頓

孟子說道：「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這是最有經驗的說法，以上所稱述(甲)(乙)(丙)(丁)(戊)五點，雖爲善政善法，然使地方親民之官不能善體上意，則其成敗，亦未可知。故明太祖於地方行政的根本規劃詳爲制定外，對於地方吏治復不惜嚴加整頓，以保其成。今試細爲分析，大約可得：(甲)重視吏治(乙)謹慎簡(丙)嚴明考察(丁)整頓循吏(戊)懲治貪污，五點：略述如下：

(甲)明初對於吏治之重視，可於明史選舉志見之。其文云：「選舉

之，科目以登進之，慶舉以考選之，論選以布列之，天下人才，雖於是矣。大抵明初用人，不限於科目。太祖雖開科舉，而監生與薦舉人才參用者居多，故其時布列中外者，太學生最盛。明史選舉志稱：「洪武二十六年，遷監生劉政龍等六十四人為行省布政按察兩使及參議勳使等官。其一旦重而用之，至於如此。其為四方大吏者蓋無算也。」這可說是更途的正本清源。及選任以後，即又勸其考課。明史循吏傳序云：「明太祖徵元季吏治廢弛，民生凋敝，府州縣吏來朝陳辭，論曰：『天下新定，百姓財力俱困；如鳥初飛，木初植，勿撻其羽，勿撼其根，然後能成。』」而愛人，貪者必賤人以肥己，你等戒之！」洪武五年，中詔有司考課，首學校與桑諸實政。日無知縣馬亮善督運，無課農興十效，立命罰之。一時守令畏法，潔已愛民以當上指，吏治不廢矣。下逮仁宣，推循休息，民人安樂，吏治澄清者百餘年。是明初考課，首重課廉與士，其事似簡，而確能得為治之本，故能吏治澄清者百餘年，則其為效已可觀了。

（乙）明初簡任官吏的謹慎，亦為前代所不及。例如荐舉一事，山林巖穴之士，一登薦牘，便加簡任，同時被荐之士，亦可各舉所知，似屬為途甚寬；然使偶有貪污不職，則舉者與之同罪。執行甚嚴。故舉者輒重視其事，不敢輕易荐人，同時又每備廷臣附守，以中央吏治昭著的人才，出為朝廷耳目，其事亦屬甚善。趙翼廿二史劄記其事云：「宣德五年五月，擢廷臣九人為知府，趙豫松江，况鍾蘇州，謙以禮西安，莫愚常州，邵受武昌，馬欽杭州，陳本探吉安，陳鼎建昌，何文淵溫州，皆賜敕乘傳行。是年十一月，又擢廷臣二十五人為知府，李驥河南，王堯慶慶，魏德餘州，許敬軒汀州，壽椿南陵，王昇桂州，莫宗正統元年，亦擢廷臣十二人為知府，王源湖州，李湘懷慶，霍溥南康。」這是較顯著的例證。

（丙）簡任之後，復加以嚴明的考課。考嚴嚴密，則善惡自彰，而循

十五布政使分治天下，永樂初遣給事中御史分行天下，有司奸貪者逮治，其後又遣監察御史三十六人巡行天下，按察官吏。這朝，不為例。尋又遣郭敦以禮部侍郎給事中陳循巡行天下，查糾以刑部侍郎奉敕，考察兩廣兩湖方面官。有故入官參政者，正統初又分遣大臣考察天下方面官，劉辰往四川云貴，悉奏諸其不職者。徐宗奉命與工部侍郎鄭憲考察南畿官吏，劉不法者三十人，後以為左參政，奉命與巡按考州縣吏廉潔以聞。景泰中亦遣大臣行天下，劉辰有司。禮部侍郎幹至山西調布政使以下五，餘人，巡撫朱鑑誣名幹過，幹並劾鑑。時，設巡撫，又遣大臣考察，重吏治也。趙氏所言甚是。今，中央每組各省考察團，各省吏治，省政府主席出巡各縣，廣西並制定縣長出巡各區巡視規則，無非欲使地方官吏振刷精神，並以周知廉潔而已。

（丁）地方官吏之廉潔，既已周知，則廉潔之吏，自當獎進；貪污不職者，自當懲治。吏治方有澄清之望。明史魏觀等傳贊云：「太祖起閭閻，悉舉吏為官，常以極刑懲之。然每旌賢能，以示勸勉，不專任法也。嘗遣行人賈收併鈔三十錠，內酒一尊，賜手陽知縣張德。又建陽知縣郭伯，奏丞同鑑，為政不避權勢，遣使勞以酒醴，遷其官。丹徒知縣胡夢，通丞郭伯高，金壇丞李恩進坐事當逮，中書賈多警政，帝並賜內尊，降敕褒勞，永州守於彥誠，齊東令鄭敏等十人，坐事下獄，部民列政績以請，皆復官。宜春令沈昌等四人，更擢郡守。其自下僚不棄權用者，率選尉王尚賢為鳳西參政，祥符丞鄭俊為大理卿，靜寧州判元善為參都御史，芝陽令李行案為刑部侍郎。至如懷寧丞陳希文，宜興縣王復春，先以善政擢，已知其貪廉，旋置重典。所以風厲激勸者甚至，以故其時吏治多可紀述云。」這是實跡顯明的實效。

（戊）明初懲治貪污，其例不勝枚舉。如關馬都尉歐陽倫賂死，及乎刃胡大海的兒子二事，彰彰在人耳目。廿二史劄記更詳云：「洪武十八年，昭遠天下官吏之為奸者赴京師棄城。帝初

一、尚書新論之一

假使有人問我中國古代政治所採的主義是什麼？我可不曉得的。答覆他是民主主義。什麼叫做民主主義呢？就是一切政治上的設施，皆以人民為根本。換句話說，就是執政者在施政時，應以人民的意向所趨為其出發點，同時，更以人民的福利所在為其歸宿點。整理中很簡單，因為隔離了人民，便失去了施政的對象；而且喪失了人民，也就根本不成其所關國家和政府了。尚書關於此點，已有很切要的說明

大禹謨云：「可畏非君，可畏非民，喪非元后何哉，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

五子之歌云：「口可近，不可下，民無邦本，本固邦寧」；

又云：「葛天仇予，予將執依」；

太甲云：「一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

咸有二德云：「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

泰誓云：「自我則后，虐我則仇」。

這就是說君與民互相依賴，君位全靠民心來維持；國民不可分離，國民即為天命所繫結；政治之要，首在親民，必須「本固」而後「邦寧」，必須「先克允懷」，而後「一人有慶」（伊訓）。不要多提，儘能使「民允懷」呢？這自然歸於在位的人，隨時注意長心的種種：

洪範云：「庶民惟星，眾有好風，眾有好雨，日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禮記云：「人無於水監，當於星監」；

左傳云：「其不能誠於小民，今休，王不敗後，用頤長於民也」；

廣雅云：「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

人心不古，譬如天上星星，有的好風，有的好雨；又如地下的水，有的好舟，亦能變舟，變幻無常，險惡難測；於此可見人心之變幻

顯言，藉以察其公意之所在：

大禹謨云：「罔遠道以于百姓之譽，罔幽百姓以從己之欲」；

又云：「裕樂，捨己從人」；

洪範云：「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

下箴，汝則從，罔從厥後，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卿士逆，作內吉，作外凶」；

梓材云：「以既庶民，罔既遐王，惟邦君」；

君德云：「汝惟風，下惟草，國既取，莫或不艱，有庭有與，出入民言，罔聞」。

能修德求一德，則下情得以消，不難收集其廣益之功，而去其不道之弊。如果民衆違背上命，動輒怨謗，即宜追究其原因，並力求所以補救之道：

五子之歌云：「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

康誥云：「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怨不怨」；

無逸云：「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於小大，伊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厥或者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攸曰，朕之愆，尤若時，不啻不敢會怨」；

君陳云：「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遷上所命，從厥攸好，汝實敬其在薄，時乃罔不獲，尤升於大猷」；

君牙云：「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嚴設，與其相以同其易，民乃寧」。

口是不可防的，口怨是極可畏的，惟有敬德思報，纔能「衆民於變時雍」（詩典）。「至於大小，無時或怨」（無逸）。其有對於國家時生諷解者，更應披肝瀝膽，不辭開導之功：

伊尹云：「啓者遷於夏，夏不道有居，……王命衆悉至於庭，王

若曰：格汝衆，予告訓，汝猷勵乃心，無傲從康；

又云：「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既告用刑其有衆，咸泝勿憂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愛，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

又云：「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汝百姓於朕志，罔罪汝衆，汝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肆予冲人，非亂厥謀，弔由靈，各非於違下，用宏茲賞。」

這是商邑迫於水災，盤庚遷都時所發表的警告，叮嚀周至，直視民衆如家人，迄今讀之，猶覺其平易近人，親切有味！且從此項論告中，可以看出君民休戚與共，苦樂相關的道理：

盤庚云：「古我前后，罔不惟之承，保后胥感，鮮以不浮於天時；……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於前。」

「惟喜康共」，即係「與民同樂」之義；「保后胥感」，不也就是「愛民之愛者」亦愛其愛」的最好說明嗎？上一體，情交融，這才真正表現了親的精神，發揮了親民的作用。

不過要達到親民的目的，他的根本問題還在執政者的修養如何？道德如何？換言之，即須具備下列的幾個條件：

(一) 明察 舜典云：「明四目，達四聰」；太甲云：「視遠惟明，聽德惟聰」；堯仲之命云：「詳乃親聽」；罔命云：「香在文武，聰明齊聖」。

明察可說是親的入手工夫，耳目如果聰明，則對一切事物的觀察和處理，必然洞燭靡遺，巨纖悉當。否則昏愚昧，根本就配不上「親」，更從何處「親」起。

(二) 勤勞 大禹謨云：「克勤於邦」；皋陶謨云：「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又云：「予未有知，思日贊贊襄哉」；益稷云：「予想日孜孜」；旅葵云：「夙夜罔或不勤」；召誥云：「上下勳」；泰誥云：「惟於德明光於上下，勳於四方，時作樂於時，

不迷文武勳敬」；無逸云：「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自朝至暮，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威和萬民。」

適豫爲亡身之媒，勤勞乃親民之本，從來「怠忽荒政」的人，必得「天怒人怨」的結果；而多少「福國利民」的專業，又何嘗不自「夙夜匪懈」中完成呢？

(三) 寬平 舜典云：「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大禹謨云：「唐御衆以寬」；仲虺之誥云：「克寬克仁，彰信兆民」；伊訓云：「代以寬，兆民允懷」；微子之命云：「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君陳云：「寬而有制，從容以和」。

上有寬仁之德，則下無不平之鳴，而濟孕育於光天化日之中，終使無一夫一婦不被其澤，不得其所，這是親民的要義所在。

(四) 戒慎 大禹謨云：「敬戒無虞」；五子之歌云：「予臨天下，懷乎若朽索繫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湯誥云：「俾予一人，輯寧汝邦家，茲朕未知稼穡於上下，懼懼危懼，若將限於深淵」；太甲云：「無輕專事惟維，無安厥位惟危」；君牙云：「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正之臣，克左右維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於春冰」；罔命云：「惟予弗克於德，嗣先人宅丕后，休慎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

朽索六馬之箴，虎尾春冰之喻，戒慎恐懼，若有所不敢爲，以此臨民，必愈見其寅恭而親切！

(五) 好善 仲虺之誥云：「改過不吝」；說命云：「夙夜納誨，以輔古德」；又云：「無恥過作非」。

有了這種樂爲善，不，滿假的精神，纔能以飽與爲懷，體易和民衆接近；大學之以「親民」和「明德」並稱，也正是「個道理」。

(六) 負責 湯誥云：「其汝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汝萬方」；盤庚云：「邦之賊，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泰誓云：「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罪己就是負責的表示，一個負責的執政者，必視國民爲莫大的尊榮和榮譽，而以親爲其致力之目標，殆無疑義。

至於親民在事實上的具體表現，不外：

一、安民 皋陶謨云：「在安民，……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安即求社會一切秩序的安定，使人民各能安居樂業，以遂其生活為施政的基本工作。

二、愛民 康誥云：「嗚呼，小子封，嚮德乃身，敬哉，……」

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康王之誥云：「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於天下；文侯之命云：「惠康小民」。

富使其平，過不深究，視如赤子，念切痼瘼，這種愛民的真情，可謂流於極點！

三、養民 舜典云：「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又云：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大禹謨云：「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惟和；」康誥云：「予嘗汝威，用奉畜汝衆；」洪範云：「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梓材云：「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

引掖斯。於生養安全之地，實為古來施政的一貫方針，管子曾經說過「衣食足而後知禮義，倉粟實而後知榮辱」；孟子復云「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若無恆心，放僻邪侈，無不為己，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一也」，可見經國之道，養為先，且不得養而陷於罪，雖有峻法嚴刑，亦終無濟於事，所謂「引養引恬，監罔攸辟」者，意即此。

四、教民 康誥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顧命云：「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鬯陳教則肆，肆不遠，用克達版，集大命；」畢命云：「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於殷頑民，遷於洛邑，式化厥訓，既歷三世，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

「富而後教」殆屬治民不易之常經，陳列教條，使相傳習，濡染既久，自然俗美化淳，萬方安謐。惟負有教民之責者，首須樹立楷模，以身作則；

康誥云：「罔克於民，內乃在位；」

呂刑云：「爾身克正，罔敢弗正。」

身教易從，理無或爽；第教務務期一切，訓示不厭周詳，其或弗

初，更宜內省厥咎；

康誥云：「矧今罔迪不適，不適，則罔政在厥邦，……今惟民不聽，未戾厥心，迪庸未得，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

多方云：「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勸要囚之，至於再，至於三，乃有不用我降汝命，我乃其大罰殛之。」

教告至於再三，尚復怙惡不悛，除了罰殛以外，祇有使之別居，畢命云：「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典，殊厥井疆，俾克敬慕。」

「殊厥井疆」，即屏之遠方，不得與善民同其鄉里，這與禮記所謂「不變妻之嫁，不變葬之墓」的意義，正復相同。

不過這種疏離和隔離的方法，僅適用於「其頑不靈」的極少數份子，並非根本之圖；因教民重在啓發，要以潛移默化，使之改過遷善為上策也。

五、保民 康誥云：「用保×民；」又云：「用康保民；」梓材云：「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無逸云：「懷保小民；」秦誓云：「以保我子孫黎民。」

保民即保護或保衛人民，使其不受災禍的侵凌，共享康寧的生活。假使有而不能保，則黎民亦涉於空虛，更談不到社會的安定，還說什麼養民和教民呢？所以「教養衛」三者的作用，實是相輔相成，不可偏廢，而且他的性質與內容，具有同等的重要！

此外，古代政府對於一般窮苦無告的人民，尤能特示矜憐，而加以愛護和救濟；

大禹謨云：「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太甲云：「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

盤庚云：「無虐孤有幼，各長於厥居；」

洪範云：「無虐鳧獨而長高明；」

大誥云：「允蠶綠寡，哀哉；」

康誥云：「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鰥，亦曾文王惠鰥寡）；

梓材云：「王啓監，厥亂爲民，曰，無管哉，無管慮，至於救，至於歸婦，合由以容」。

伯也云：「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在位，愛知小人之依，能保惠於庶民，不敢侮鰥寡」。

呂刑云：「羣后之迷在下，明明柔克，錄無遺」。

世困窮，哀厥寡，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思有一夫一婦不被其澤者，若以推而納之溝中，這種救政施仁必先無告的憐憫，實爲親民二字最好的形容和解釋。 蔣委員長在此所謂「政治的道理」中，曾說「我國古時政治哲學特別注重於疾病痛苦困窮的救濟，……我們革命，目的在救國救人和救世，如果不能救濟疾病困窮痛苦的同胞，一切的事業都是空的」，這對於古代政治的觀察，以及今後革命的主張，真可謂洞澈深微，得其髓要。同時，委員又說「古時所謂仁政，就是要發動人民的力量，救濟人民的痛苦」，因爲早經政府消極的救濟，效力或不至有時而窮，惟有發動廣大的人力，實生產於互助之中，纔能發生積極的作用。關於這點，也可引用尙書中的話，以爲印證：

咸有一德云：「匹夫匹婦不獲日靈，民主同與成厥功」。

這就是說人民如有一份力量不獲貢獻於國，國力便將在無形中遭受一份損失，甚至影響到整個事業的進展和成功。反言之，政府必須善用其力，使之各盡所能，以貢獻於國家社會；遇必要時，並可酌量情形，善用其力。

康誥云：「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於東國洹，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和，見單於周」。

召誥云：「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政位於洹，越五日甲寅，位成，……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誓，命庶殷，侯甸男邦伯，既既命厥庶，庶殷丕作」。

這是周公和百官公衆集民工，建造洹邑的故事。「和會」一語就說來，「丕作」一語合力以赴，其餘公諸事，顯顯顯，顯能不失文王「經營商臺，庶民子來」的遺教。吾人由此可知古代對於民力的重視，

卓具成規，何況今日正在建國途中，其有需於發動人力，以開闢發展，充實國力者，尤殷且鉅。孫中山先生曾在「地方自治開始進行法」中，規定「老年及殘廢的人，始有享受地方自治供養之權利，其餘人，必當悉盡義務，乃得同享權利」。所謂「悉盡義務」者，即「基於農事者爲公家墾荒，長於織造者爲公家織布，長於鑄鑄者爲公家鑄屋」，每人能爲公家各做若干月之義務，則衣食住的各項設備，皆可藉勞力以成功；並謂「人民各負雙手，祇要各盡其力，則供事具備，不必於窮海以竭，搜括難得之金錢，始能從事於自治」。這與前面蔣委員長「發動人民力量，救濟人民痛苦」的訓示，互爲發明，若今符節。不特要徵用民力，首須樹立民信，願盡義務，既不可稍涉侵脅，也不宜流於輕率：

湯誓云：「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

桀誓云：「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

湯誓而流，而難使協於力；臨事不敬，更將使民失其心；惟有勤於操字，一本公誠，得其可勞者而勞之，則人民自必樂於服從，毫無尤怨。這一點固有的經理論，我願現在一般政治學者，多多地予以表揚；同時，這一點固有的親民精神，我更願現在一般從政人員，深深地加以培養！

當代論壇 第九期

每冊定價三元

主編者 吳光炎

編輯者 吳方仁

發行所 聯合文化編譯社

總發行者 文信書局

重慶保安路一七〇號